

温志拔
著

知识、文献、学术史

南宋考据学研究

**Knowledge, Literature
and Academic History:**

A Study of the Textual Research
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



知识、文献、学术史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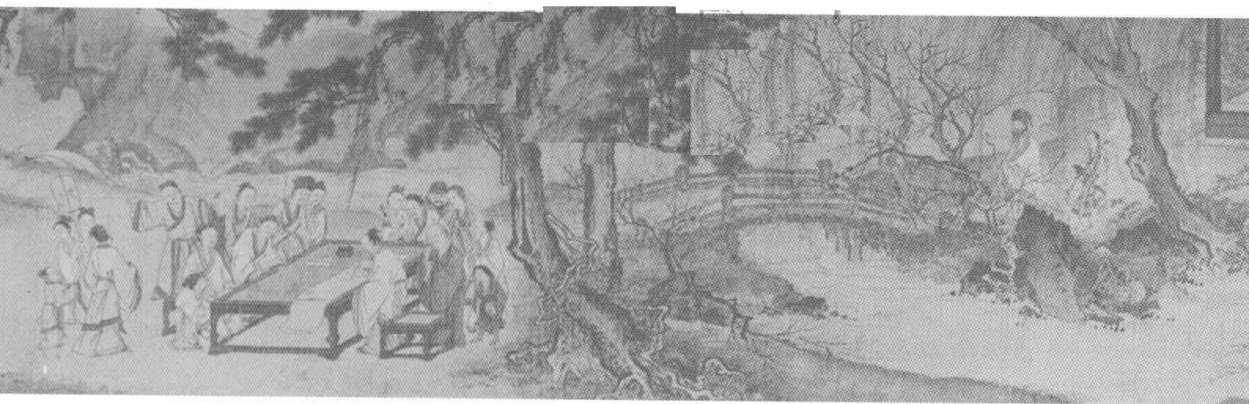
知识、文献、学术史

南宋考据学研究

温志拔
著

Knowledge, Literature
and Academic History:

A Study of the Textual Research
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知识、文献、学术史：南宋考据学研究 / 温志拔著. —北京：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9.5

ISBN 978 - 7 - 5203 - 3833 - 2

I. ①知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考据学—研究—中国—南宋
IV. ①K092.4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000296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宋燕鹏
责任校对 石春梅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印 张 20
插 页 2
字 数 317 千字
定 价 85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绪 论	(1)
一 缘起与意义	(1)
二 对象与范围	(4)
三 学术史回顾	(9)
四 主要研究方法及构想	(14)
第一章 南宋考据学的学术文化史考察	(17)
第一节 宋学语境下南宋考据学的兴盛	(17)
一 两宋经学疑古思潮中的南宋考据学	(18)
二 宋学义理的发展与南宋考据学	(26)
第二节 南宋考据学兴起的社会文化机制	(42)
一 南宋士人社会的形成与考据学的兴起	(43)
二 从技术到学术:南宋书籍刊刻与考据学的兴盛	(52)
第二章 士人的知识世界:南宋编撰文献与考据学(上)	(63)
第一节 南宋经典类编与考据	(63)
一 南宋经疏类编文献的兴起	(64)
二 南宋经疏类编文献的考据方法	(70)
三 南宋经疏类编考据的学术史考察	(75)
第二节 南宋类书编撰与考据	(79)
一 南宋类书编纂的主要考据方法	(80)
二 南宋类书编撰考据与南宋浙学渊源	(92)

第三章 士人的知识世界：南宋编撰文献与考据学(下)	(103)
第一节 南宋士人地理学著述的编纂与考据	(103)
一 士人博学知识世界中的南宋地理学著述	(104)
二 南宋地理学著述考据的专门化和方法总结	(113)
第二节 南宋年谱著述中的文化生命总结与考索	(119)
一 南宋年谱的功能指向及其变化	(120)
二 南宋年谱考据的主要方法和形态	(126)
第三节 南宋文人笔记考据的学术化	(131)
一 文人精神与宋代笔记	(133)
二 南宋文人笔记的博杂考据	(138)
三 南宋文人笔记考据的学术化	(148)
第四章 书籍的学术史：南宋校勘目录专书与考据学	(158)
第一节 校以为学：南宋校勘专书的考据学	(158)
一 南宋校勘学的发展及考据特点	(161)
二 学术系统中的南宋校勘考证特征	(167)
第二节 南宋目录学专书考据学	(176)
一 南宋解题目录的考证	(176)
二 前代目录专书研究与考证	(181)
第五章 以注为学：南宋注书与考据学	(187)
第一节 注释史脉络中的南宋注书	(188)
第二节 南宋史书自注考异部分的考据学	(193)
一 《长编》自注考异及其北宋政治文化的反思	(194)
二 《要录》自注考异的史家考据精神	(203)
第三节 南宋文集注释的考据学	(207)
一 诗道文统与南宋文集注释的发展	(208)
二 江西诗学与南宋文集注释	(224)
三 南宋文集注文中的考据特点	(228)
第六章 南宋考据学的特点和谱系	(243)

第一节 南宋考据学的主要特点	(244)
一 作为日常文化学术活动的考据学	(245)
二 作为当代文献编撰整理的考据学	(253)
三 理据为主、旁证为辅的考据学方法	(262)
第二节 南宋考据学的谱系	(281)
一 博学考据的文人士群	(283)
二 史官传统与良史士群	(286)
结语 作为学术史和文化史的考据学	(297)
参考文献	(301)
后 记	(312)

绪 论

一 缘起与意义

近代以来，由于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，中国的哲学研究排斥知识与事实，而重视概念推演分析，各种哲学史研究往往“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，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”^①，讨论符合西方哲学背景，涉及宇宙论、本体论、人性论、认识论等命题的少数“哲学家”及著作。这一研究方法也深刻影响了思想史、学术史的研究。以宋代为例，哲学史的研究基本就是以朱熹《伊洛渊源录》所描绘的学术谱系为畛域，而思想史研究，或在理学天理性命之外，增加其政治、经济、史学、教育思想等问题的论述，或将“蜀学”“王学（荆公新学）”“浙学”等宋学各学派的哲学、政治学、史学思想也纳入其中，很明显，所谓“宋学”仍是以义理学为主，讨论宋代学术新特点的概念表述。这一概念对超越单纯的程朱五子加陆九渊哲学史叙述模式，扩展与深化宋代思想史研究，无疑具有重大的认识和方法论意义。但也应当看到，现有思想史叙述模式，仍具有明显的对历史过程丰富性、复杂性的遮蔽，属于后人的合理性重构。所谓“宋学”，也只是“突破了理学的篱笆，标示出了理学以外各学派的存在”^②，以义理学发展逻辑为尺度，度量历史过程的是非得失，追寻突破汉唐经学的所谓历史上升和前进。思想史演进的脉络和线条似乎被清晰勾画出来，与此同时，历史过程中存在的诸种曲折、反复、回溯、融合，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漠视了。如果说思想史研究必然以义理

① 冯友兰：《中国哲学史》（上册）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7页。

② 何俊：《宋学：认知的对象与维度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9年第6期。

的阐发为中心,展示思想体系、概念、范畴的演变发展逻辑,那么学术史关注的主要是学科史的总结,从知识(学)和方法(术)的角度,描述学科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。学术史侧重的是全部事实的考察记录,哲学史、思想史侧重的是概念和方法的总结概括,以及意义与价值的认识评价。

新近的一些研究,努力打破学科疆界,将哲学史、思想史放置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。例如南京大学出版社的思想家评传丛书,将思想史的范围扩大到各学科各领域“杰出人物所创造的业绩和事功”,从中抽象出思想理论^①。该丛书所构建的“思想史”即容纳了包括文学家、科学家、文献学家在内的多学科的学术思想。又如葛兆光的《中国思想史》将视野从少数精英思想家延伸到非精英的层面,用非精英的思想重构思想史^②;余英时的《朱熹的历史世界: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,将思想史还原到政治历史过程中,关注宋学义理的历史背景以及政治运作^③。美国、日本学者,也不断突破以理学哲学思想为定义的新儒学(Neo-Confucianism),转而使用更具历史色彩的“道学”,并着重研究“道学家”的社会实践,例如社仓、书院、刻书等^④。

相对于思想史与文化史,学术史与文献学之间的学科鸿沟更为阔大。清代以来汉宋之争所代表的文献学与义理学的对立,至今似乎依然如故,几乎还没有一部学术史真正关注义理学以外的众多学术活动,如文献校勘、注释、编撰,博物考古、考据辨伪等,更遑论学术史事实所表达的学科演进,以及对于学术思想的影响。在严守学科疆界划分背景下,学科之间的对话并不多见。问题在于,宋代恰恰是一个学术创新多样,治

① 巩本栋:《领域的拓展与方法的更新:论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〉的思想史意义》,徐雁等主编:《中国学术与中国思想史》,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,第1—15页。

② 参见葛兆光《中国思想史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。

③ 参见[美]余英时《朱熹的历史世界: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。

④ 参见[日]吾妻重二《美国的宋代思想研究》,[美]田浩编《宋代思想史论》,杨立华、吴艳等译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,第7—29页;[美]田浩《朱熹的思维世界》,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;David S. Nivison and Arthur F. Wright, *Confucianism in Action*, California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59; [日]小岛毅《作为思想传播之媒介的书籍——朱子学“文化历史学”序说》,吴震、[日]吾妻重二编:《思想与文献:日本学者宋明儒学研究》,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264—281页。

学范围宏阔的时代,大量流传的学术成果、典籍,不能被单一的思想史脉络所容纳和展示。

正如邓广铭所列举的,宋代儒家学者实际上包括三个层次:理学家、一般新儒家学者、普通儒者^①,对于最后一种,田浩认为我们“所知更少”,他们包括“现在的思想史研究很少触及的诗人、画家、史学家、类书的编者、科学家,甚至于政府官员等儒家人士”^②。理学以外的这一庞大群体,除已进入思想史的蜀学、新学、浙东学术等新儒学士大夫,还有更多不能被宋学各派所表述的群体,包括宋代笔记、类书、地志、年谱的编撰者,四部文献的辑录、校勘、注释者等。文献学与学术史的沟通,应更多地关注文献编撰、整理为中心的学术成果,探讨学术发展的文献活动场景,分析文献活动所表达的学术史意义。宋代大量的文献编撰、整理成果,是元明以后乃至今日古代文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,相当部分一直为各学科研究所充分利用,例如宋代类书、笔记等史料。然而工具化的普遍应用,并不等于深入的本体认知。超越分散零碎的史料运用,关注文献成果本身的学术归属、价值指向,学术思想如何影响和提升文献整理,才是学术史与文献活动的对话和沟通。

考据学是文献活动的核心,是文献活动过程中所体现的学术原则、精神和方法,对于考据学的研究,正是要建立学术史与文献活动之间的对话联系,即讨论学术史的文献考据基础,文献考据活动所体现的学术思想背景和价值追求。就南宋考据学研究而言,就是要整体地关注笔记、类书、地志、年谱、注释、校勘、考史等众多文献活动的成果,讨论这些考据学活动和成果背后的学术和思想立场,理学为中心的义理之学如何利用和构建自身的考据学基础。而就考据学自身发展而言,南宋考据学也是清代乾嘉考据学以前,另一个发展高峰时期^③,具体成果十分丰

① 参见邓广铭《论宋学的博大精深》,王水照主编《新宋学》(第2辑),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,第1—7页。《宋史》的编修者们,在《儒林传》外别立《道学传》,后人对此颇有一些不同意见。实际上,《文苑传》《隐逸传》中的大部分人物都可归为儒家学者,此类合传及《儒林传》与《道学传》的并立,正反映出宋代学术史上,包括义理之学在内儒学不同侧重的专门化、多样化。

② [美]田浩:《朱熹的思维世界》,第313页。

③ 有学者认为:“其学萌芽于先秦,初创于两汉,一盛于南宋,再盛于清乾嘉时期。”参见漆永祥《乾嘉考据学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,第3页。

富。为何考据学的首次发展兴盛，未出现在经学时代的汉唐，而是在理学兴盛的宋代，特别是理学主潮化的南宋，这不能不是学术史研究需要回答的课题。

古文献存在和使用的历史时空下，他们与编撰者、使用者一样，是一定学术兴趣、主张，特定价值关怀的产物。古文献实际上也是有生命、有价值的，因此，对于古文献的研究，不应该仅仅将其作为死的工具，也应该将其视为可以对话，展现古人学术文化精神的对象。从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古人，具有什么的知识基础，不同文人群体拥有怎样的知识兴趣，如何看待、怀疑、证明或者辨伪文献中的各种知识，对文献内容的不同处理方式，体现了怎样的社会文化背景、条件和目的，彼此之间具有相似知识和学术方法的古文献编撰者，如何构成相关学术群体并形成学术流派，等等。考据学的研究，也是探究古人的文献意识、文献态度，发掘古人的知识和文化生命特征。考据学不仅是文献学与学术史的交流，也是文献学与文化史的沟通。通过南宋考据学的研究，展开的可以是一个面相的南宋学术史，也是以文献为中心的另一面相的文化史。

二 对象与范围

学术史上，“考据学”既可以指史事、名物、制度等古文献内容的考证，也可以指与义理学相对的古文献学相关学科，如文字、音韵、训诂、版本、目录、校勘等，学术界一般将二者概括为考据学的广狭二义^①。考据之所以成为学，不仅要有所涉及的对象和范围，还应包括其学术精神、原则和方法。换言之，文献学诸学科中运用各种考证方法，追求和贯彻求实原则，体现核实的治学精神，才是考据学，文献学本身并非考据学。对考据学所涉及的对象作静态描述，仍然只是小学、文献学本身，而非考据学范畴的研究。对于这一问题，已有学者进行了反思，如乔治忠认为：

^① 参见顾颉刚《古籍考辨丛刊》（第一集）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1页；漆永祥《乾嘉考据学研究》（孙钦善序），第1页。

考据之能够成“学”，则须在学界出现了数量较多、影响广泛的专门著述，实际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治学方式，并且具备一定程度的关于历史考据的学术理念。^①

乔文主要讨论历史考据学以及关于历史考据的学术理念，但扩大来说，对于整个考据学研究也具有同样的问题，考据构成“学”，除了明确讨论的对象，包含具体的论著成果，还必须具有独立的方法和稳固的学术理念。这一学术精神和理念，以及独立的方法，不只是在具体的小学、文献学论著中体现出来，也在相对固定的从事考据学活动的群体，在相互讨论中表露甚至明确地表达出来。罗志田言：“‘考据’是否可以算一种‘学’，自‘考据学’名称兴起的乾嘉之时，便有争议……若转从社会视角看，既然有这许多学者对‘考据之名目’聚讼不休，尤其著书授受者已不下数十家，这些人也多自名其所治为‘考据学’，则以时人眼光言，考据确呈独立成‘学’之势。”^②学术史上看，清代考据学或乾嘉考据学的成立，并且成为一代学术中的一个重要方面，除了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学术范围、方法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，即其反对宋明义理空疏的共同的自觉意识，以及因此形成的朴实求真的“学术理念”。众多学者对考据学相关话题“聚讼不休”，甚至相互对立，除了具体的对象结论，还包括学术精神、原则和方法的争辩。当“考据”成为同时代学术圈所共同讨论，形成一定学术“语境”时，“考据”才成为“学”。“考据，作为治学的一种方法，各代都有”^③，作为实践活动的“考据学”，不存在“成立”于何时的问题。本书将宋代作为考察时段，首先在于本书认为，宋代是形成考据学共同的学术理念、学术语境的时代，也是“考据学”学术自觉或成立的时代。

关于考据学成立于何时的问题，晚清民国以来各家说法相当不一致，

① 乔治忠：《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》，陈祖武主编：《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——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》，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361—383页。

② 罗志田：《事不孤起，必有其邻：蒙文通先生与思想史的社会视角》，《近代读书人的思想世界与治学取向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307页。

③ 顾颉刚：《中国史学入门》，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132—133页。

主要包括：汉代说、魏晋南北朝说、唐宋说、宋代说、明代说、清代说等^①。各家论说，基本依据只有一项，即某个时代有大量的考据活动或成果。事实上，考据学之成为学的标志，至少应有两个方面：一是考据学是否自觉意识到与义理学存在差异，并与义理学分开，否则考据学只是义理学的一部分，只是阐释义理的工具，很难说有考据之学的存在；二是必须形成文人士大夫共同讨论的关于考据学的精神、方法的话题，即自觉意识到考据学自身的特点，总结自身的方法。

汉唐时期，就考据学所包含的具体实践门类和成果看，不可谓不丰富，特别是经学和史学领域的考据学成果，甚至有部分超越后世的经典论著。

作为一个文献复兴的时代，面对秦火之后的文献残败，西汉王朝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，司马迁、刘向父子、王充等人的古籍辨伪，特别是成帝时期刘向父子的文献整理，真正开创了中国目录学、校勘学的传统。汉代经学，尤其是东汉古文经学对经典的注释，推动了文字、训诂、音韵的发展成熟，经典传、注、笺过程中对语言文字诸学与校勘、版本的综合运用，以及名物典章、历史故实的考据等。清人胡培翬评其“于两汉经师之说，综括靡遗，而又网罗百家，博稽六艺，证其同异，辨其是非，故所注各经，历代遵习”^②。但在舍经学无他学的汉代，这些考据显然是从属于经学系统的具体方法，而非相对独立的“考据学”。尽管汉代古文献有关的小学、文献诸学已经相当全面，但由于考据和义理并未成为彼此独立差异的学术理念，不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，考据学所具有的学术精神、原则和方法等不同于义理学的自身独特性，并未被经学家自觉意识到和共同谈论，而只是经学本身的工具和活动中的部分。汉代并未在训诂、经注系统外形成独立的考据学，其经学考据是自发的、依附于经学的行为，自然也谈不上意识到考据的理论与方法论的自觉，可以说是有考据而无考据学。

魏晋南北朝隋唐作为考据学发展的重要阶段，主要是史学考据学的

① 参见郭康松《清代考据学研究》，崇文书局2001年版；汪启明《考据学论稿》，巴蜀书社2011年版。

② （清）胡培翬撰，黄智明点校：《胡培翬集》，“中研院”文哲所2005年版，第228页。

发展。经学方面虽也有不少著名经学家，和唐代《五经正义》为代表的经学注疏的集大成，但根本上说，这些成果仍属于汉代经学的范畴。真正代表这一时期考据学实践发展的，是史学考据学的开始。魏晋时期以后，随着史学的独立，这一时期开始了历史考据学发展的时代，此后史学考据学始终处于不断发展兴盛的上升路途之中。同样地，由于考据学仍只是史学领域校勘、注释、考证、辨析活动的工具，其自身特点、理念仍未作为异质性的学术范式被意识到，尽管这一时期的考据成果为后代提供了丰厚的资源，但仍不能说，考据学已真正独立成为具有学术意义的话题，亦即考据活动仍未独立为“学”。一种学术的自觉意识，必须有与之相对的学术形态作为参照，才能引发。

考据学的真正成立，应是与之相对的义理学成立，并形成差异乃至对立学风的结果。中唐以来疑经所引导出的义理性命之学，使得汉学成为学者广泛批判的对象，训诂考据方法成为与之迥然不同的学术范式。正是以己意说经、自由阐发经义的时代，义理学凸显的同时，也强化了义理之学与训诂考据之学的差别乃至对立，并明确表达了训诂考据之学与义理、辞章之学的相互独立地位：

古之学者一，今之学者三，异端不与焉。一曰文章之学，二曰训诂之学，三曰儒者之学。欲趋道，舍儒者之学不可。^①

所谓“训诂之学”是指沉溺于文献训诂、名物制度的“说经”，“儒者之学”则指洛学所主张的性理明道之学。伊川这里明确表述了宋代儒学已从义理考据合一，变为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、文章之学三分的格局。正是宋儒对义理之学的强调，凸显和开始了考据学的独立，从此义理、考据、辞章成为传统学术分野的重要术语。南宋学者郑樵曾曰：“后人学术不及前人之学术也。后人学术难及，大概有二：一者义理之学，二者辞章之学……二者殊途而同归，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，而非为实学也。”^② 郑氏反对空谈性理之学，在义理、辞章外，推崇“实学”。其所

①（宋）程颢、程颐著，王孝鱼点校：《二程集》，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87页。

②（宋）郑樵撰，王树民点校：《通志二十略》，中华书局1995年版，第1827页。

谓“实学”，则是包含古籍文献分类考辨在内的博物之学。程颐尊义理之学而轻训诂考据之学，郑樵则尚考据实学而轻义理之学。朱熹则主张在体贴义理之外，不妨作适度的考证功夫，在广泛强调体贴自得之学以求圣人大道的理学风气下，朱熹独重考证之学对于证悟性理的价值。这也是南宋理学对北宋过分强调内心体道乃至走向禅法的反拨，考证汉学也日益受到了理学家的重视，为学“考证”而有所“援据”的学风受到普遍重视。考据之学成为追求义理之外，同样受重视的命题与方法。南宋周必大第一次明确提出“考证之学”：

大抵考证之学易差难精，亦在乎秉笔者审之而已。^①

考据之学，不论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，还是作为与义理、辞章相对的学术形态，第一次成为宋代学者讨论的共同话题，成为学术文化现象之一。他们即使面对强势的义理之学，仍自觉选择毕生从事考据之学；或者身为义理学者，在总结审视自身学术得失之余，重新认识汉学、考据之学的优劣，并且主张考据学与义理学相结合。但都将考据之学置于新的学术背景下认识，并自觉运用考据方法，或研究朴实学术，或补充义理之缺。宋代雕版印刷兴起以后，读书、藏书、校书、刻书成为普遍的学术或非学术活动，文献考订、校勘才真正成为学者日常化的、普遍化的学术行为，即使义理学者，义理阐发需建诸坚实的文献基础之上，也日渐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常识。因此，自觉的考据学意识、大量的考据学活动、丰厚的考据学成果，使宋代真正成为考据学独立自觉的时代。明代，不论是中期还是晚期，本质上说，是对宋代这一学术传统的短暂复兴，真正接续这一传统的正是清儒。因此本书所讨论的宋代考据学，是作为学术史的考据学，这不仅因为其自觉独立的理论认识价值，也在于它超越一朝的学术史意义。

从更宽泛的学术、政治环境看，辨疑思潮盛行的两宋时代，考据学更成为宋儒求得经典文本、圣人本意的重要手段。宋学辨疑的目的，是

^①（宋）周必大：《毛拔萃洵文集序》，《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》卷五十二，《宋集珍本丛刊》，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，第51册，第537页。

求得证实，考据学不仅仅是经学文字训诂释义的工具，也是辨伪存真的重要方法。在辨疑思潮发展过程中，宋儒越来越认识到，以义理为目标的宋学，并不能排斥训诂、校勘、辨析的考据学。北宋到南宋，宋代学术经历了义理、考据对立再到将义理建诸考据活动之上的否定之否定。南宋晚期宋学的回归经史博考，正是新的关系认识层次上的回归。此外，两宋党争，包括与之密切相关的国史朱墨本之争，也使得当代史为中心的史料考证辨析，成为更加自觉的方法，被运用于各类史部文献的编撰中。不同政治立场的士大夫，在参与史书编撰过程中均有自己坚持认可的叙写标准，都有各自以为真实的历史叙述，史学考据不再仅仅是对古史的书斋式的文字考订，而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和党派利益的展现。在考据中坚持何种原则、精神，成为关涉君子之德的重要选择，能否坚持价值中立式的考据，不是纯粹文献真实的问题，也是政治立场和道德价值取向的问题。正是在这样的学术、政治、文化交织的环境中，考据学不再仅仅是附庸和工具，而是一种政治文化力量和道德价值选择。也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文化语境中，考据学真正进入了学术史、文化史的范畴。

关于本书的时间断限问题。北宋士大夫关心如何超越汉唐文献，获得自得之学，体悟宇宙天地的“道理”，追求形而上的义理；南宋士大夫则更关心如何在日常文化生活中，兼容古今文献、并举诸儒众说，希望从中获得天道性命的文献印证。在南宋士人看来，北宋儒学尽管多原创的哲理阐发，却难免空谈心性，缺乏博雅之风。大致而言，南宋不论是理学士大夫，还是一般文人士大夫，对于考据学的运用都更为重视，对于考据学意识更为强烈、更为自觉，都表现出了对于博学考辨、朴实据信的态度。南宋学风与北宋不同，开拓性不足而深化有余，在趋向内转心性的同时，重视总结与反思北宋学术，体现出更多的立足文献、考辨证实的特点。因此，本书选择南宋为讨论断限，考察理学背景下的南宋文献考据学发展，同时也希望有助于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南宋的学术史状况。

三 学术史回顾

作为文献研究的治学方法，考据学所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，因此各个相关领域的研究都涉及了考据学的讨论。这些个案研究，从不同角度、

层次展现了前人对宋代考据学的研究成就与特点。

经学领域的考据学研究，主要集中在对经学文献的辨伪考订上，如叶国良《宋人疑经改经考》^①，杨新勋《宋代疑经研究》^②，杨世文《走出汉学：宋代经典辨疑思潮研究》^③等。两宋的疑经辨伪运动本质上说，是一次经典的古文献复归运动，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将经典视为古代文献进行考据、校勘、辨伪的求实学风。因此，疑经运动对于考据学独立自觉意识的形成和学术方法的创新的影响，是现有研究较少涉及而值得关注的问题。

史学考据是传统考据学的重点，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其他领域翔实，主要包括宋人史籍校勘、编纂、考异等。如王仲荦、郑宣秀《〈通鉴考异〉的史料考订价值》^④，裴汝诚、许沛藻《〈续资治通鉴长编〉考略》^⑤，邹志勇《正史与说部之互证：李心传考据史学辨析》^⑥等。前贤的研究多集中于《通鉴考异》《长编》《要录》等少数著作上，主要是史料来源的考辨。宋代以“考异”为名的著作还有不少，甚至不限于史部，考异作为书籍修纂及学术研究体例，仍值得更多地关注。

宋代笔记较唐代具有更浓厚的学术性，各种杂考类笔记多有名物典章的考证，并且出现了以考据为主的笔记作品。不过学界对宋代考据笔记，较多在史料利用，真正的本体研究较为少见，较为系统性论著只有廖菊楦《宋人考据笔记研究》^⑦，其前三章概述部分，主要论述了宋代考据性笔记兴起的学术背景，宋代考据笔记注释、分类体例的演变及其与类书的关系等，第四章则杂考三部笔记的文献形态、编撰方面的问题，与考据学的关系并不密切。对于考据笔记的个案研究，主要集中于《梦溪笔谈》《容斋随笔》等少数作品上，如孔天祥《沈括〈梦溪笔谈〉的

① 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1980 年版。

② 中华书局 2007 年版。

③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。

④ 《史学史研究》1984 年第 2 期。

⑤ 中华书局 1985 年版。

⑥ 《山西师大学报》2003 年第 4 期。

⑦ 博士学位论文，北京大学，2003 年。

文献学成就》^①，周建《试论〈容斋随笔〉的考据学成就》^②等。

总体而言，宋代类书、政书、目录书研究，极少涉及考据学研究。其中冯浩菲将古籍整理体式中类书体式的一种称为“考论体类书”，包括“逐次考论体类书”和“撮撰加考论体类书”两种^③，包弼德（Peter K. Bol）的“The Qunshu kaosuo, and Diversity in Intellectual Culture: Evidence from Dongyang County in Wuzhou”一文^④，讨论了科举、类书编撰与《周礼》文献考订风气对《群书考索》的影响，并举其中有关古今田制的摘取、编纂和考订为例，说明《考索》的学术特征。宋代书目著作多考据精审、体例严密，故前人对书目的考据研究稍多，武秀成师将《玉海·艺文》著录体式总结为“辑考体”：“大量汇辑各类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为基础，同时又融入作者自己的考订与见解”^⑤；郝润华讨论了晁氏《读书志》文献考辨方法、辨伪，年代考证、生平事迹名物等史实考证^⑥。相关书目的类目编排对于知识体系的总结与认知的影响，博学考据之风与书目的发展关系，南宋书目考据之风兴起的动因及学术史意义讨论等，仍是尚可开掘的领域。

对于学者考据学成就及方法的研究，白寿彝成于20世纪30年代的《周易本义考》《朱熹辨伪书语》，前文强调了朱熹恢复古《易》的观念和努力，突出了朱熹重视古本之真的文献意识，后文辑录了朱熹有关辨伪的文字，提出朱熹辨伪考据“左验”的七大方法，认为朱熹的考证方法与后世考证学相比虽不免“幼稚”，却具有开创新意义^⑦。钱穆《朱子学新学案》^⑧，也是早期的重要成果。全书反复提及并映证朱熹作为理学巨擘的汉学功夫，包括其经学训诂考据、史学考据求实精神、礼制典章名物的考索之功，还特立《朱子之校勘学》《朱子之考据学》等章对其校

① 硕士学位论文，北京师范大学，2008年。

② 载刘乃和主编《洪皓马端临与传统文化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。

③ 冯浩菲：《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390—393页。

④ 田余庆编：《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。

⑤ 武秀成：《陈振孙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84页。

⑥ 参见郝润华《晁公武评传》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。

⑦ 白寿彝：《朱熹撰述丛考》，《白寿彝史学论文集》（下册）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999—1194页。

⑧ 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。